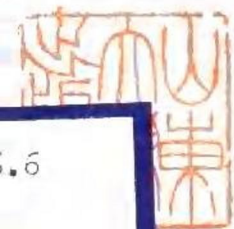


现代三作家论集

张杰 蔡万江



.6

2

现代三作家论集

张杰 蔡万江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625 字数：170千字

1988年5月第1次出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7—5607—0101—9/I·16

定价：1.95元

前 言

孙昌熙

1951年秋天，在华岗校长的倡导和支持下，山东大学开设了“鲁迅研究”课，由华校长、刘泮溪先生、韩长经同志和我分题讲授。在大学里开设鲁迅研究课，为全国首创，所以听课的人很多。当时正在中文系学习的张杰，也听了这门课。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对鲁迅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2年秋季，山大成立了工农速成中学。根据工作需要，张杰调到速中任教。他在教学之余，经常在我主编的校刊《新山大》上报导速中情况。他还经常以浓重的抒情笔调写人物特写或文艺通讯。这些文章给山大校园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

1955年秋季，张杰回到中文系学习，又听我的“《文心雕龙》研究”等课程。但他的兴趣似乎仍在现代文学方面，有时也写点文章，本书收入的《鲁迅论汉字改革》一文就是这时写的。

六十年代中期，张杰从泰安师专寄给《文史哲》编辑部一篇《论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刘泮溪先生看过后觉得文章可用，不过，要作点修改；篇幅也过长，需要压缩一下。但此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彼此的命运都不佳，我也很少听到他确凿的消息了。

“文革”中期，山大莫名其妙地迁往曲阜。我自己带着孩子住在学生宿舍里的一间小房里。大约是197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张杰突然来访。经过这场浩劫，师生相见，倍感亲切。我那间房子里除一桌一椅和一张双层床外，别无长物。对着暗淡的灯光，师生进行了长谈。谈了彼此在“文革”中的遭遇，谈我们相识的一些师生的情况，谈当时的所谓教育革命，也谈了有关鲁迅研究方面的问题。在“文革”中间学生杀老师的回马枪，甚至给老师以拳棒，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也确实有不少学生记挂着老师，甚至找机会还来看望老师，这是使人感到无比欣慰的。所以我们的那次相见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杰带着满脸的喜悦又来看望我。我们谈祖国的大好形势，谈未来的光明前途，也谈五十年代初期的往事。当年讲授“鲁迅研究”课的四位同志，“文革”期间华岗、刘泮溪先生已先后离开了人间！谈至此，我们相对黯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暖了知识分子的心。张杰也干行政，也教书，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点文章。看到年近半百的老学生焕发了青春，我的喜悦之情是难以自抑的。

1979年初春，张杰陪着一位山东大汉来看望我，这就是昌潍师专的蔡万江同志，他憨厚质朴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万江也是搞现代文学的，他和张杰一样在我面前执弟子礼，我同样以学生待之。1981年烟台举办全国鲁迅研究讲习班，有十几位专家、教授前往讲课。事后，万江在销售冷落

的情况下，印刷了《鲁迅研究讲习班论文选集》，全国鲁迅研究学会将这本文集作为学习材料发给会员，为研究会办了件好事。

1981年秋天省鲁迅研究学会成立，大家选我任会长，我和田仲济先生、薛绥之先生共掌会务。张杰与万江均被选为理事，他们帮助学会做了不少工作。此后他们或来信或来访和我讨论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友情日渐深厚。

他们在繁忙的事务工作之余，仍勤奋学习，努力写作。有的文章我也积极推荐在刊物上发表。

现在，他们的部分论文要结集出版，让我说几句话，这大概是因为我不仅熟悉他们的为人，也熟悉他们文章的缘故吧！

这些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除个别属于宏观研究外，绝大部分都是对作品的微观研究，是他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所得的硕果，其中不乏新的见解。他们注意鲁迅精神的阐发，也注意鲁迅作品艺术性的开掘。《鲁迅——人民教师的光辉典范》、《〈呐喊〉〈彷徨〉比较观》和学习鲁迅小说的三篇札记——《作品命名的艺术》、《人物命名的艺术》、《景物描写的艺术》，都是优秀的论文，文笔活泼、自然，既没有矫揉造作的文态，也没有八股气，单就这一点，也是值得一读的。

有的文章，今天看来似无新奇的意见，例如《鲁迅论汉字改革》、《论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但在三十年前、二十年前这些文章却能给人以启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拓者的足迹。

鲁迅、郭沫若、茅盾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三位文学巨匠，是永远放射着光辉的三面旗帜。学习他们，研究他们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希望张杰、万江两同志继续努力对三位作家进行系统的研究，写出更多更好的论文，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7年春于济南山大宿舍

目 录

前言.....	孙昌熙 (1)
鲁迅——人民教师的光辉典范.....	(1)
师生·战友·伴侣	
——读《两地书》.....	(8)
《呐喊》《彷徨》比较观.....	(15)
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	(29)
作品命名的艺术	
——学习鲁迅小说札记(一).....	(34)
人物命名的艺术	
——学习鲁迅小说札记(二).....	(39)
景物描写的艺术	
——学习鲁迅小说札记(三).....	(44)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学习《狂人日记》艺术手法琐记.....	(51)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学习鲁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60)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学习鲁迅“鞠躬尽瘁”为人民的革命精神.....	(66)
“把文字交给一切人”	
——鲁迅论汉字改革.....	(69)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	
——鲁迅修改自己文章几例·····	(74)
鲁迅杂文漫议·····	(78)
论《故事新编》的创作主张及其它·····	(89)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读鲁迅书赠日本友人的诗·····	(102)
论郭沫若的小说创作·····	(109)
试论郭老的《牧羊哀话》·····	(120)
读《洪波曲》随想·····	(124)
郭沫若论鲁迅·····	(131)
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茅盾·····	(140)
茅盾论鲁迅的小说	
——学习札记·····	(173)
茅盾论小说创作·····	(179)
茅盾短篇小说《创造》新探	
——从《幻灭》《动摇》到《创造》·····	(191)
《水藻行》及婚姻道德小说	
——兼与《春桃》、《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	
之比较·····	(206)
把茅盾研究推向深入·····	(217)
附录	
忆华岗校长····· 张 杰	(222)

鲁迅——人民教师的光辉典范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教育工作方面，也同样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绍兴师范学堂等校任教。到北京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公中学、中国大学等八所学校兼课。后来由于军阀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南方，由厦门到广东，仍然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教授的课程有生理学、化学、博物学、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等。1927年到上海以后，虽然没有在学校正式担任教职，但他曾多次到上海的劳动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继续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

鲁迅从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造就革命的新人。他认为，这种新人应该是“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为了达到培育新人的目的，鲁迅总是将革命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斗争中成长，在成长中战斗。他谆谆告诫学生千万不要成为“书呆子”和“书厨”，以致迷失方向。鲁迅不

仅给青年指明斗争的方向，还教育青年掌握斗争策略和方法。要他们分清敌、友、我，注意保存自己，团结朋友，打击敌人，多采取“壕堑战”，以极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战果。

当有的青年学生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斗争任务艰苦或疾病缠身而苦闷徬徨的时候，鲁迅总是激励他们的斗争意志，帮助他们认清革命的前途。他说：“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记谈话》）“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致韦素园信》）

每当反动派压迫残害革命青年学生的时候，他总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起而抗争，奔走营救。不论“女师大风潮”，还是广州“四·一五”前后的风风雨雨，他始终和革命的师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表现出他革命的硬骨头精神和在政治上对学生的极大关怀。

鲁迅在课堂教学中也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因为“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他教小说史时，总是向学生“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他以为单是讲小说史，即使教的烂熟，对于社会的改革上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他是要通过小说史的讲课，培养些能够用笔向旧社会进攻的人。”（许钦文《跟鲁迅先生学小说》）

作为一个革命的教师，鲁迅在教学中认真严肃，很注意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教给他们从事革命的本领。他在绍兴中学堂教生物学时经常到野外去采集植物，自作标本，通过直观教具使学生更快地掌握科学知识。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小说史时，为了查阅资料，他跑遍了北京一些有名的图书

馆，亲手抄写资料。许寿裳回忆说：“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们所信服。”（《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懂得，作为一个教师，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要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认真钻研专业知识，努力搞好科研。因此，鲁迅一贯重视科研工作。他在杭州、绍兴教书时，经常用小纸条抄录中国古代小说的资料，并分门别类加以整理。这些纸条估计至少有六千多张，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一千多张。这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刻苦的学习精神和严肃的治学态度。

鲁迅无论在哪里，始终是勤奋学习，艰苦地进行科学研究，并把科学研究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既是授课的教材，也是科研的硕果。

鲁迅在教学领域里，敢于革命，敢于创新，决不墨守成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被封建文人视为淫书、闲书，受到歧视，以至中国小说一向无史。鲁迅从大量的材料中，对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了小说创作的经验和发展规律，并写成讲义，使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入大学讲坛。这确实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由于鲁迅勤奋好学，深入研究，所以他的授课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这两门课程，同时还要兼国学院研究教授。据他的学生回忆：“本来在文科教室里，除了十来个学生之外，老是冷冷清清的；可是从鲁迅先生来校讲课之后，钟声一响，教室

里就挤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站着听了，教室里非但有各科学学生来听讲，甚至助教和校外报馆记者也来听讲了。”

（陈敦仁《忆鲁迅先生在闽南》）鲁迅在书信中也说到当时的情况：“此地学生似尚佳”，“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两地书》）至于他在北京女师大授课的情况，许广平同志回忆说：“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没有一个人逃学，也没有一个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一致拥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欣慰的纪念》）鲁迅的课堂教学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质朴而生动的语言，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的丰富多彩。”（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鲁迅以高度的负责精神做好课堂教学工作，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在课余的时间里多方面帮助青年学生提高业务水平。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读死书，而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还劝告青年“不但要读中国的好书，也要读外国的好书。并且科学书籍也要多浏览，不要仅仅抱住目下流行的时髦书。”“必须要懂得多种外国语，多学会几种更好。”（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鲁迅在课余的时间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娱乐，给青年学生修改文稿，校对，介绍出版，接待来访，回答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碰到的种种问题。凡青年学生有什么要求，只要他能办到的总是尽力而为。正如他在厦门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中所说：“我们……想努力写一点东西，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并且希望他支持我们，他毫不踌躇地满口答应：

‘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鲁迅先生这种最直爽的、最热情的、最亲切的帮助青年的态度，怎么不令人感动！他是我们真正的文学导师，又好象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鲁迅曾说过：“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致杨霁云信》）他还说：“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致张廷谦信》）许多青年在鲁迅的教育帮助下走向革命的道路，有的成为革命的作家。

鲁迅多次谈到，中国的工农大众，深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又加繁难的方块汉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非常重视工农子弟上学，培养工农出身的人材。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时，厦门大学学生会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招收的学生是校中工农的子女及附近农村穷人的子弟。当这个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鲁迅先生还在忙着写作，他却从百忙中，应邀到会演说。他说：“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李淑美《鲁迅支持厦大平民学校》）表现了鲁迅对工农子弟的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

鲁迅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青年学生。他关心学生的健康。他的学生韦素园患肺结核住疗养院，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到疗养院去看望韦素园。有的学生学费有困难，他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资助他们。他的学生董秋芳当时在北大上学，没有学费，鲁迅予以垫付。李霁野学费有困难，鲁迅主动给予帮助，李很感不安。鲁迅写信通过韦素园劝慰他说：

“霁野学费的事，就这样办理。这是我先说的，何必客气。我并非‘从井救人’的仁人，决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正不必不安于心。”（《致韦素园信》）有的学生离开学校寻找职业没有路费，鲁迅给予帮助。如韦素园离开北京到开封做翻译工作，鲁迅借给他40元川资。有的学生考入大学没有保人，鲁迅出面作保。有的学生没有职业，他积极设法为其寻找职业。学生就业了，鲁迅仍然关心着他们。1924年7月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的邀请，长途跋涉到西安去讲学，他在百忙中接待了北大已毕业的学生王儒卿等人的来访。鲁迅“详问了他现实的工作，生活情况，回不回家等等，处处显示着关怀备至的亲切，使他感到鲁迅处处都在教育青年，时时在热爱青年。”（单演义《鲁迅来西安讲学前后》）

总之，鲁迅对学生政治上的帮助，业务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真正做到对学生全面负责。因此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热爱。

鲁迅就是这样，不图名，不图利，“并没有略有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两地书》），“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致曹白信》）。他象一个辛勤的园丁，以自己的心血浇灌这些可爱

的革命幼苗。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为青年学生的成长，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鲁迅热爱教育工作，尊重教师的劳动。他认为对教师“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且“还要给以相当的尊重。”鲁迅对他的老师藤野先生的尊敬与热爱就是生动的例子。

藤野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的“解剖学”教师，是一位品格高尚，无民族偏见的日本进步学者。他和鲁迅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离开仙台的前几天，藤野先生又把他找到家里，交给他一张照片，在照片的后面，写着“惜别”两个字。鲁迅与他的老师离别了20年之后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鲁迅在他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里写道：“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藤野先生高尚的精神品质成为激励鲁迅进行战斗的巨大力量。

鲁迅所以如此尊敬和纪念他的老师，因为优秀的教师是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为革命培养人材的主要力量。为了给革命事业“造出大群的新战士”，需要千千万万个优秀教师。

师生·战友·伴侣

——读《两地书》

1925年3月，北洋军阀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倒行逆施，北京的上空暂时笼罩着浓重的乌云。在新思潮的激荡下，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许广平向她敬爱的老师鲁迅先生写信请教，向他陈述“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请求鲁迅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①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两地书”就这样开始了。

在当时不少的青年学生中，尽管有可贵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对黑暗的旧社会，对罪恶的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还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些青年学生只感受到学校的黑暗、教育当局的反动，一心一意想改革教育。当时，由于广大学生和进步教师们的斗争，章士钊被迫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由屈映光继任。天真烂漫的青年们为此奔走相告，喜庆自己的胜利。鲁迅以敏锐的眼光看到这一危险倾向。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指出屈映光“与‘士钊’盖伯仲之间或且不及。所以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事实上学校与教育当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教育的改革必须有社会之助力，社会若得不到根本的改革，教育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改革的，因为“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鲁迅认

为“旧社会根柢是非常坚固的”，而且它还有“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②面对着当时的现实状况，鲁迅主张对旧社会的进攻必须用“壕堑战”。许广平给鲁迅主编的《莽原》写稿，她曾想用真名发表。她认为那是“敢作敢当”，鲁迅则认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是不值得的，就给许广平改用了她曾用过的笔名“非心”发表了。鲁迅自己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他是怎样用了“壕堑战”法。这种战法，无疑收到了很好地保存自己，有力地打击敌人的战斗效果。鲁迅很不赞成许褚式的那种“赤臂上阵”的战法，认为那是“有勇无谋”。他也不赞成子路“结缨而死”的作法，认为他“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当然，他也不会同意许广平在来信中提出的主张，“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认为，此法“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这是因为“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弄不好还是革命者吃亏”。

鲁迅认为，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除必须要“立足实力”以外，还必须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必须坚持长期的艰苦奋斗，在这个问题上性急是不行的。当时许广平作为一个激进的青年，有时想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快一时之意”，有时又觉得茫然无所适从，感到“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她这苦闷的原因，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是在“性急”。鲁迅谆谆告诫许广平等进步青